

剑指江淮

谨以此书
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六十周年暨张爱萍将军
诞辰九十五周年！

第一章 烽火燃烧扬子江

1. “又是挥戈纵马时”

公元 1937 年 7 月 7 日。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抹去的一天。

这也是张爱萍与他的战友们、亲人们和全国同胞们难以忘却、刻骨铭心的一天。

日本侵略军于 7 月 7 日晚 11 时，向北平西南约十五公里处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炮轰宛平县城。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中华民族“卢沟晓月”的诗情画意，侵略者的马蹄和战车碾碎了中国人民自由与和平的梦想。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所属官兵在旅长、被周恩来誉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的何基沣将军（1939 年 1 月党中央批准的秘密党员）指挥下，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该旅所属吉星文团在卢沟桥打响了抗日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翌日，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 月 9 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向林森、蒋介石等及全国军政长官发出“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通电。7

月13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7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装备完毕,待令出动。”7月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言辞激昂,听众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

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四大队教员、27岁的张爱萍,面对刚刚发生的“七七事变”和如火如荼的抗战形势,想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动员和号召,内心像怒吼的黄河、长江一样,卷起巨大的感情波涛。“抗大”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易名。作为“红军战士”,张爱萍迫切要求到部队去,到前线去,向日本侵略军开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热切地企盼“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然而,张爱萍的这个愿望未能立即实现,却经历了一个躁动和喧哗的心路历程。此前的一天,与张爱萍同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的同学、红军长征时的老战友、红三军团十三团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彭雪枫突然要离开学校,调出去工作了。一想到马上就要和这位年长自己四岁的老战友、出色的青年将领分别了,张爱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一对军中才子,两位长征战友,因朝聚夕别,不禁诗情涌动,两句诗脱口而出,表达了各自内心的情感与对未来的憧憬:

——“又是挥戈纵马时”;

——“旗开得胜看来日”。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热血在他们的胸膛里奔流,他们殷殷嘱咐,互道珍重,彼此相约:“在抗日的战场上再见!”

不久,张爱萍所在小组又有同志调走了,走向部队,奔赴抗日的战场。

此时,张爱萍有点儿坐不住了。每当晚霞满天的时候,他与同

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散步,在一块儿议论前线的战事,畅谈毕业后的志向。听说红军大学还要办下去,不少同学怕留下当教员,便纷纷给学校、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到前线去,其中在信上签名最积极的一个就是张爱萍。后来,到红军大学讲课的毛泽东也知道了不少同学写报名信,要求到前线去,不想留校当教员的情况。他热情鼓励了同学们“要求到前线去”的积极性,但他郑重宣布:凡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当教员,没写的可以离校。理由十分简单:为适应新的形势,培养更多的人才,学校还要继续办下去,并且要扩大。毕业分配时,不少写报名信的同学,包括张爱萍在内,真的被留下当教员了。当然,这对于张爱萍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崭新的战场。他潜心学习钻研恩格斯、列宁的军事理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国古代兵书战策及中外文学名著,决心教书育人,在新的岗位为抗日做贡献。

这是一个美丽而静谧的夏夜。弯月如钩,群星闪烁。

一曲洞箫,以它优美而深沉的旋律,绕着延安的山坡,传向远方,令人荡气回肠。

突然,听到有人喊:“张爱萍,主席叫你!”他立即放下心爱的竹箫,径直向毛泽东的窑洞跑去。

张爱萍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很有礼貌地向主席敬礼。落座后,他急切地等待毛泽东的具体指示。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毛泽东操着湖南湘潭口音,微笑着对张爱萍说。

张爱萍以为主席在试探他,笑而未答。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毛泽东认真地说道。

“真的?去哪个部队?”张爱萍急急地问道。

“到上海去,干你的老本行。”毛泽东笑着说。

一听“到上海去”这四个字,张爱萍原先的那股高兴劲头顿时减弱了许多。他曾想过到部队去,到前线去,如今,却要他到上海

去,又是干地下工作,觉得有浑身的劲使不上,便随口说道:“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爱萍同志,那里很重要,”毛泽东极为严肃认真地说道,“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上海,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他告诉张爱萍:“刘晓、潘汉年已在上海,并成立了党的江浙省委,由刘晓负责,潘汉年负责半公开的统战工作。你到上海去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协助刘晓把省委军委组建起来。”

但张爱萍的心在部队,在前线,任何职务在他心里都没有位置,于是,他笨拙地讲起了“价钱”:“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以洪亮的声音说道,并扬起了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曾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你去比较合适……”

然后,毛泽东向张爱萍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并进一步强调: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日本大举进攻华北,接下来日本人必然要进攻上海,再图夺取南京,上海肯定会失守,南京也会失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告诉张爱萍:“上海失守以后,外围的农村需要开展游击战,你们军委就是要组织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的农村游击战争,动员组织民众,支援国民党军队抗日,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去,开展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张爱萍请示毛泽东应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指示他要根据当地情况,怎么好就怎么干。还嘱咐张爱萍到南京请示博古、周恩来,到上海同刘晓商量,他们对上海的实际情况更清楚。毛泽东最后问张爱萍:“你还有什么要求?”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作为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张爱萍向毛泽东郑重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对了,这才是你啊!”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这时“红大”已经改为“抗大”。根据张爱萍所提出的要求,毛泽东立即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打了电话,请他给“到上海有重要使命”的张爱萍派几个同志,罗瑞卿在电话里表示,“让他自己挑,

要谁给谁”，张爱萍听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回到宿舍，张爱萍心潮澎湃，心绪难平。回想起刚才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与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握别时的情景，回想毛泽东同志窑洞的灯光，他感慨良多。现在，正是男儿“挥戈纵马”时，他挥笔写下了这首纪实与抒情的诗篇：

“七七”炮轰卢沟桥，
抗日烽火半壁烧。
黄昏突传紧急令，
疾步驱前主席召。
马灯摇影映窑洞，
时局纵论筹略韬。
倭寇首侵掠北国，
再图淞沪窥宁朝。
弃甲乞降泥首转，
拱手千里望风逃。
创建敌后根据地，
军民游击淞沪郊。

2. 从延安到上海(上)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张爱萍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延安，告别领导和战友，和他的几位新战友踏上了抗日征程。随同他一起到上海开展工作的，均为中央决定选派的几名师级军政干部。这四位红军干部是吴克华(红一方面军师参谋长)、余立金(红二方面军师政委)、彭林(红二方面军师政委)、曾广泰(红四方面军师政委)。

在西安逗留期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与淞沪会战。驻

沪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将军指挥下，英勇杀敌，共毙伤日军五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企图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此间，张爱萍他们接到了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张爱萍他们要立即脱下工农红军的灰色军装，换上国民党的黄色军装，与国民党军装稍有区别的是左臂上有个布制的八路军徽章。在临离开西安时，他才不得不把红军军装交出去，但还是悄悄地把红军军帽及“抗大”发的红军胸徽留下了，作为永久的纪念。对此，他颇有感慨，赋诗一首，题为《西安换装》，以表达当时自己真实的感情：

车过宜君谒黄陵，
哀鸿半壁痛凄楚。
十年饮恨血成河，
大义联合御外侮。
红军改名八路军，
卦旗易我五星。
西安换着军官装，
红星帽徽永珍储。

肩负重任的张爱萍想到党中央的嘱托和毛泽东亲切的话语，急切地想尽早离开西安，奔赴淞沪抗日战场，去完成党所交给自己的历史使命。

身着国民党军官服装的张爱萍一行终于乘上火车，沿陇海铁路东进。他们在徐州站换乘津浦线火车，驶向南京。在列车上，张爱萍等目睹国民党的败军游勇气势汹汹，恣意横行，叫声骂声不绝于耳，老百姓见了没有一个不怕的，妇女老人见了更是胆战心惊。作为八路军的一员，张爱萍和颜悦色地对一位责问国民党兵的长者及身边的同胞们说：“乡亲们！我们虽然身穿国民党军服，但我

们是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为了打日本鬼子，才改名为‘八路军’。我们的军队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军民之间鱼水情深。在我们部队，官兵一律平等，上下级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归根到底，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听从毛泽东主席的号令。我们军队的当务之急就是坚决打击日本鬼子，保卫我们的国家，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他的一席话还未说完，列车上的乘客就把张爱萍等几个八路军团团围住，一个个伸出手来，向他们表示亲切而热忱的问候。刚才的那位长者，更是兴奋不已，满面春风，他激动地对张爱萍他们说：“八路军真好，真是军民一家人啊！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长者的话音刚落，车厢里就爆发出阵阵掌声、笑声和赞许声。

张爱萍以一位诗人所特有的敏锐与执著，将途中的所见所闻，赋诗成篇，以《列车上》为题，诗的结尾处激情地写道：

“全国军民皆如是，
抗日胜利有保证。”

张爱萍等乘坐的津浦线列车，很快就由徐州驶抵该线的终点站南京的浦口，并乘火车轮渡驶向南岸的下关。火车轮渡鸣响汽笛，在扬子江上破浪前进。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波涛滚滚的江水向东奔流，卷起了一个个漩涡。凝视着一泻千里的江水，张爱萍的心中卷起了一朵朵激情的浪花。是的，抗战的烽火正燃烧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志于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背负着民族的期望，决心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他们将在江河湖海、丘陵山地、青纱帐中、水网地带，摆开杀敌的战场……张爱萍透过茫茫的扬子波涛，似乎看到了一幅最终战胜日寇的令人振奋的动人画卷……

来到南京以后，张爱萍等亲眼看到大街小巷弥漫着一种积极抗日的氛围。他们明显地感觉到，这里的形势已经很紧张。

在南京傅厚岗 66 号(今青云巷 41 号)八路军驻宁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亲切接待了张爱萍一行人。来到了这里,张爱萍就像到了家一样,感到特别亲切、温馨。他们分别和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握手致意之后,便听取周恩来等领导的指示。

因时间紧迫,周恩来只向张爱萍扼要地介绍了当前上海与南京方面的形势,交代了任务,要他们到上海迅速去找刘晓同志。周恩来强调说,你们这次去上海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除主席在延安交代的任务外,还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叶剑英还同张爱萍商谈了在江苏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等重要问题。

临走时,周恩来让张爱萍换上便衣,并亲切地叮嘱他:“上海吃紧,注意安全!”张爱萍穿上半旧的灰色西装,还想把西安悄悄留下的红军帽带走。“不行不行!”周恩来连忙制止,“上海形势严峻,一点红军的迹象都不能暴露。不要因小失大。”张爱萍无奈,但还是把那枚红军胸章悄然藏了起来。与周恩来等告别之后,换上便衣的张爱萍等人就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此时,上海市内的火车已断,李克农开了汽车到龙华车站来接张爱萍他们,并一起去上海办事处找潘汉年,通过他和曾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比张爱萍大两岁的老战友刘晓接上了关系。由张爱萍和同去的几位同志组成江浙省委军委,张爱萍任书记,比张爱萍小三岁的陈家康为军委秘书。当时,张爱萍他们就住在跑马厅上海饭店,江浙省委军委就设在这里。

作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上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已名闻遐迩。张爱萍与上海有不解之缘,这次出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是他第三次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了。在此前的 1929 年 6 月、1930 年初秋,年轻的共产党员张爱萍曾先后来上海追求革命真理、两次被捕,身为红十四军营教导员因战斗负伤后到上海养伤,并从上海奔赴中央苏

区……

张爱萍参加了江浙省委，主持军委工作。后来，他回忆说，这次回上海工作在他一生中是工作性质或工作形式的大转折，即由从属地位转变为领导地位，由群体工作转变为独立或相对独立工作。在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中，他是跟着摇旗呐喊的；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运动及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基本上是上边决定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初当红军及到中央苏区工作乃至长征途中当了师、团领导，仍然是在做具体组织落实或实施上级批示的工作。可是到上海主持省委军委工作就不同了，尽管大政方针已定，但怎样去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更多人商量，基本上是靠自己拿主张、出路子、定盘子。因此，这段不长时间的工作对张爱萍锻炼不小。

3. 从延安到上海(下)

根据中央的指示，江浙省委于1937年11月初在上海重建，直接领导上海、江苏和沪杭线这一带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工委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为军委书记。第一次参加省委会议时，张爱萍和刘晓各自都介绍了一些情况；张爱萍谈了中央交代的任务以后，会议就研究上海周围的抗日游击战怎么开展的问题。自“八一三”抗战以来，上海的形势十分紧张，枪声炮声不绝于耳，上海的市民惶惶不安，一些工厂、店铺关门、转移，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纷纷逃往郊区乡下。而大批难民则逃往上海周围的松江、苏州、无锡、常州、奔牛、嘉兴等地避难，难民中大部分是工人。难民饱受日本侵略者之害，也最易动员奋起抗日。省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了一条工作方针：首先抓难民工作，在难民中进行抗日战争的宣传教育，组织他们回到农村，一旦日本军队占领京、沪、杭一线，这些难民就可以成为我们党

在江浙农村发展抗日游击队的基础，准备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此之前，陈家康已在上海做难民工作，因此，这项工作仍由他负责，在难民中发展我们的力量。

根据省委和军委决定，张爱萍等计划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进步力量，吸收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搞战地服务团。对于“八一三”抗战的前景，省委作了充分估计。省委认为，国民党军队一定会从上海撤退，日军一定会占领上海。上海一旦沦陷，军委要是秘密隐蔽在市区来指挥农村的游击战，肯定不方便，也不利于地下党工作的开展，因此着手筹划将军委迁到农村去。最初，军委决定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分开撤退时，在抗敌前线嘉定县境内的张劲夫所在的战地服务团即留在敌占区，搜集散兵、枪支，在当地农村隐蔽，作为军委撤出上海后的指挥机关。

上海失守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致电省委，要张爱萍主持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经南京接受转到浙江地区的新任务。因此，上述计划未能实现。不久，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工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鄂豫皖区委民运部部长、中共皖东省委书记。后来，张劲夫与张爱萍都到了新四军。

江浙省委军委与上海地下党和松江民团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于是，张爱萍便特派彭林到松江，做地方民团的工作，以掌握民团武装，彭林后来与浙东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军委还派曾广泰到戴笠系统的一支部队的特种大队工作，这支部队是张爱萍到上海之前，就由上海地下党的关系所建立的。曾广泰去参加这支部队，是准备伺机独立出来，发展成为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武装。

这样，留在上海的省委军委成员只有张爱萍和吴克华、陈家康三人了。从1937年9、10月份开始，军委就举办军事训练班，主要对象是做难民工作的学生党员，一共办了三期，训练了约四十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如何组织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省委调了学委系统的陈伟达来主持班务工作，张爱萍和吴克华负责讲课。

在讲课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学员向张爱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讲的都是红军在山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的周围地区都是平原水网地带,该怎么打游击呢?当时,鉴于我们党和军队还没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学员的这一问还真把张爱萍给问住了。课后,张爱萍和吴克华等几个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认为上海外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是平原河网地带,但农村广阔,村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占领所有村庄,它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镇。而我们则可以在有条件的各村庄里分散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等到队伍发展了,再根据实际敌情,相对集中行动,进而发展成游击军,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简言之,即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昼伏夜出,相机打击敌人。张爱萍把这一设想提交省委和刘晓讨论。省委同意张爱萍他们提出的上海外围农村是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观点,也同意他们的初步设想。张爱萍把这一意见再带到训练班去请大家讨论,学员们表示,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却赞成张爱萍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设想有道理,是可行的。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学员都被派到苏南地区组织敌后游击战争了。有的还到了苏北和浙东游击区参加工作。

上海刚失守时,张爱萍曾派吴克华到奔牛,协助蒋立组织农村游击队。

1937年11月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又继续向苏州进攻。14日苏州失守,日军又向南京方向前进。就在上海沦陷之后,江浙省委军委正准备撤出上海,到郊区开展工作时,中央代表团博古指示,以省委军委为主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到浙江工作,并转道南京接受任务。工委并增加吴仲超(原省委管外县工作),张爱萍为书记、吴仲超为副书记。张爱萍曾建议省委只派吴仲超一人到浙江,军委仍撤到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争,但省委认为,中央代表团的指示必须执行。于是,张爱萍、吴仲超、陈家康准备去

浙江。此时，日军已截断了京沪、沪杭路，并向南京进攻。张爱萍等只能从上海坐船到南通的天生港，经泰州，再乘外轮到南京。到南京时，得知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到武汉。国民党军队已溃退，国民党政府机关已迁往重庆、汉口、长沙等地。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开始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30万同胞惨遭日寇的杀害！……此时的南京，市民们拖家带口纷纷逃往乡下。大小旅店的门都关上了。张爱萍等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宿于吴仲超的亲戚家。当时，从南京到芜湖的路已不通，也无法去浙江，张爱萍等见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下的枪支到处都是。“不去浙江了，”张爱萍与大家协商后果断地说，“把这些枪集中起来，就地组织打游击。”于是，他就派陈家康去武汉，向中央代表团汇报、请示。张爱萍和吴仲超坐镇收枪，准备打游击。

第二天，陈家康自武汉给张爱萍来电话说：“中央代表团要你们撤到武汉！”放下电话，张爱萍不禁感到愕然。尽管他的一些想法不能实现，内心不免觉得遗憾，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他还是坚决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将善后工作做了周到的安排，于1937年年底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派张爱萍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做参谋工作。但是，外县工作委员会在省委的领导下，还是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十分显著的，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游击区，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区，开辟了崇明与南通、如皋、启东、海门游击区，开辟了浦东地区（川沙、南汇、奉贤）的工作等等。

历史证明，党中央作出上海长江三角洲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江浙省委直接领导了上海周围的武装斗争。作为省委军委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爱萍做了许多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4. “少将高参”

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指示,张爱萍率领主要由省军委委员组成的江浙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撤到了武汉。

1937年12月24日上午,到了武汉的张爱萍一下火车,就径直直到汉口原日租界128街89号(现为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大楼,这里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直接去找周恩来报到。

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在长江局办公楼,住着周恩来、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两个中将衔的将军,在三层楼上住着边章伍、张经武、聂鹤亭、李涛等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谋。王明曾口占一对子:“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形容长江局人才济济。

在大石洋行二楼,张爱萍见到了周恩来。他发现有“美髯公”之称的周恩来副主席,“美髯”已被剃去,连头也剃得净光,显得更加潇洒、干练和精明,比起他已近不惑之年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张爱萍向周恩来简略地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后,便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你在参谋处为少将高级参谋,其他两位同志另有安排。”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

“少将?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红军里有什么将军!”张爱萍十分困惑地问道。

“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现在红军主力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了,我们还要和国民党军队打交道,定个军衔可以方便工作。根据工作情况,对方是个中将,也可以给你个中将军衔嘛!”

周恩来还向张爱萍介绍了有关情况。

张爱萍所在参谋处分为作战组、军务组、教务组、友军工作组。张爱萍分在友军工作组，负责对桂系的联络工作。与他同住一个房子的是边章伍、张经武、聂鹤亭，他们分别在另外三个组里。参谋处的主要工作是搜集各方情报，分析敌情，做军事统战工作。因主要是同国民党军队中上层军官接触，所以，参谋的军衔是不固定的，因接触的对象而异。如参谋处的成员每星期轮流去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国民党军官一般是少将以上，参谋处派去的代表就穿着军官制服，佩戴“八路”臂章和少将军衔，挂名高级参谋；在纪念周上受到欢迎，冯玉祥等主动同八路军的代表打招呼。参谋处的成员也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一些公开会议。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谋人员轮流值班接待要去延安的学生。后来，在办事处专门设立了招生委员会；罗炳辉从延安来到了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负责抗大、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具体工作均由参谋人员去做。当时，因新四军成立不久，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八路军，要去延安，去抗大、陕公。遇到这样的难题时，张爱萍就请周恩来出面做工作。面对这些热血青年，周恩来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耐心和细致，他像会见亲人一样会见这些进步青年，他与青年们赤诚相见，推心置腹，释疑解难，热情鼓励，寄予厚望。根据周恩来的介绍，许多青年学生由武汉到了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投身于伟大的抗日事业，战斗在大江南北，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去谱写壮丽的抗战篇章。几十年之后，张爱萍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目睹这样的场面，我不仅叹服周恩来同志超越常人的充沛的精力，常常通宵彻夜不眠却毫无倦怠，更叹服他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事无巨细都尽力去做，没有丝毫的懈怠。”周恩来的这种精神对张爱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体现于他的言行之中。

1938年春天，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师以上的参谋长、政治部主

任会议。八路军派了八位同志参加，分别代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彭雪枫、周昆、边章伍、张经武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上校部长的名义，张爱萍、欧阳毅、谭政分别以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名义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会前，张爱萍专门去看望了老战友彭雪枫。战友重逢，不用寒暄客套，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语，诉不尽的情意。

他俩为自己能独挡一面、开展工作而欣慰。张爱萍特别羡慕彭雪枫赴山西，回河南，发展武装，搞得轰轰烈烈。彭雪枫对张爱萍发出诚挚的邀请：“爱萍，到我那儿去吧，帮我做做统战工作。”

此时的张爱萍也的确想到抗战第一线去战斗，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变得成熟了。他觉得，自己未来的工作还是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他俩又谈了些当前的局势，便各自参加会议去了。

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要求参加政治工作会议的所有成员，组织各种宣传队到武汉三镇作街头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部主任们对此不感兴趣，根本不愿意去搞宣传。张爱萍与罗瑞卿、欧阳毅、谭政商量，觉得这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好机会，公开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向群众作宣传，说明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改为八路军是为了抗日，八路军开辟了新的战场，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战场。

张爱萍到武汉不久，从周恩来那里受领了一项新任务：到抱冰堂训练班讲课。抱冰堂位于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在这里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共举办了两期。训练班的学员是投奔到抗日军队里不久的青年学生。

和张爱萍一起到训练班讲课的，还有他的战友与同事边章伍、聂鹤亭等，他们一起训练广西军队的干部。